

歷史空間

# 年羹堯之敗

青絲

清初曾出現過兩位著名的權臣，一是鰲拜，另一是年羹堯。兩人都因積累戰功獲封一等公，位高顯爵，又都因狂妄驕恣、罔作威福而遭皇帝降咎，被下獄或賜死。所不同的是，鰲拜之死並沒有太多的爭議，就是被斥竊弄威權、朋比營私；而關於年羹堯之死，卻有一種不同的說法，認為年羹堯參與了諸王奪位之爭——康熙死後，威鎮西北的年羹堯，掣肘了原被指定繼位的皇十四子胤禛，使之無法起兵，從而令雍正矯詔奪位成功。雍正為了防止洩漏秘密，羅織罪名殺之。

號稱「年大將軍」的年羹堯雖然武功卓著，仕進之路卻是由文臣開始。他於康熙三十九年(1700)中進士，九年後即以未滿而立之齡任四川巡撫，仕途可謂通達得志。但這也並非偶然，而是年羹堯能力的一種體現。他在四川巡撫任內，興利除弊，勇於為治，深獲康熙的好評和信任。同時他還具有統領領兵的才能。《郎潛紀聞》載，在平定青海叛亂的戰役中，年羹堯某日傳令，讓軍中士卒次日行軍，須人手攜帶稻草一束，木板一片。眾將士不解其意。第二天，大軍行至一個淤泥深坑前，年羹堯令士卒把稻草投入坑內，上面鋪蓋木板，兵馬遂通行無阻。叛軍本來據此為天險，認為清軍根本無法通過，故沒有設防，被打了個措手不及，清軍遂大獲全勝。

另在年羹堯率軍出征西藏時，某日半夜，突然從大營西邊傳來一陣風聲，驟即消失。年羹堯馬上命令一名參將率三百士卒，到大營西南處的密林裡搜索敵人，果然盡殲來敵。下屬問原因，年羹堯說：

「只響一陣的聲音絕不是風吹，而是飛鳥在拍打翅膀。宿鳥半夜被驚動，必有來敵，大營只有西南十里處有叢林密樹，敵人必定是想要在那裡潛伏，驚動了鳥兒，所以派人到那個方向搜索。」下屬聽了，無不歎服，盛讚年羹堯為一時之名將。

康熙末年，年羹堯任川陝總督、定西將軍，為經管西陲數省軍政的最高長官，在軍中擁有極高的威望。《餐櫻廬隨筆》載，某日天下大雪，年羹堯乘轎出門，隨行兩旁護衛的武卒都把手攀在轎轎上，手背上積了寸許厚的雪。年羹堯可憐他們，在轎裡下令「去手」。眾武卒卻會錯了意，以為是讓他們砍掉自己的手，毫不猶豫地集體抽刀自斷其腕。年羹堯再制止已經來不及了。由此可見其令出必行的威勢。

年羹堯的妹妹是皇四子胤禛的側福晉，他與雍親王胤禛的關係自然也更密切。而康熙在立儲的關鍵時刻，任命皇十四子胤禛為撫遠大將軍，由年羹堯協助，領軍驅逐佔領拉薩的準噶爾軍隊，似乎有讓胤禛積累軍功、將來接班繼位的意圖。這可急壞了胤禛。據說為了籠絡年羹堯，胤禛重新寵幸已被他冷落許久的側福晉年氏，傳遞出結盟的訊號，冀望在情勢突變的時候，年羹堯能夠成為牽制手中掌有兵權的胤禛的一枚重要棋子。

至於年羹堯是否參與了胤禛的奪位行動，並無明確的史料指證。但康熙駕崩後，雍正即位，大失所望的皇十四子胤禛被召回京城，沒有異動，也確有年羹堯的震懾之功。雍正順利接班後，年羹堯於次年接任撫遠大將軍之職，威重不可一世。他的妹妹年氏也被雍正冊封為貴妃。然而，恃功而驕的年羹堯卻不知道，他的好日子就要到頭了。雍正二年(1724)，年羹堯入京覲見皇帝，竟然讓陝西巡撫范時捷，直隸總督李維鈞在路上跪著送迎他。到了京城，前來迎接的大臣跪接於廣寧門外，年羹堯也是騎馬而過，視若不見，有王公下馬行禮，年羹堯也僅是點點頭。見了雍正，年羹堯依然又開腿來坐，被指傲慢不敬，無人臣之禮。

雍正即位之後，本來就在着力加強中央集權，削弱諸王和大臣的權力，看到年羹堯如此驕狂，哪裡還容得下他。次年，雍正抓住年羹堯所上的賀表中把「朝陽夕乾」寫為「夕陽朝乾」的小失誤，大做文章，認為年羹堯是故有

所指，借此解除了年羹堯的川陝總督、撫遠大將軍的職務，調任杭州將軍。然而到了此時，年羹堯依然沒有醒悟，仍然心存僥倖，盼望雍正能夠收回成命，到了江蘇儀徵後久久不去，令雍正大為惱怒。

《嘯亭雜錄》載，年羹堯任杭州將軍期間，常坐在馮金門旁發呆，挑柴賣菜的農人懾於他的威勢，都不敢往馮金門經過。當然，在他倒臺的時候，這也可以成為他的罪責之一。看到雍正有拿年羹堯開刀之意，群臣紛紛上章彈劾，共列僭越、謀叛等大罪九十二條。雍正以順應群臣所請為名，藉沒其家，賜年羹堯獄中自盡。最終，歷事兩朝、軍功顯赫的年羹堯，為自己的恃功驕橫，也有可能是知道得太多了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。

所謂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。清末，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之初，也曾遭慈禧所忌。對曾國藩來說，年羹堯恃功而驕、最終論敗一事就像一個活教材。所以未等朝廷下諭，他就自行裁減湘軍，又派人到京城暗中散佈湘軍無意北上爭權的輿論，盡量低調行事，這才避免了重蹈自古以來功臣大都難有善終的老路。



年羹堯 網上圖片

## 生活點滴

蒲繼剛

### 閱讀的快感

讀書當然是人生一大快事。當我們拿起一本好書，就像面對一位老師，而閱讀的過程所產生的快感，則像是與這位老師暢快淋漓的交流。

古人讀書，也是講究閱讀的快感的。西漢時有一個大學問家名叫匡衡，因為家裡窮，點不起燈。鄰居家的燭火從裂縫處透了過來，匡衡看後，立刻想出了一個辦法。他找來一把鑿子，將牆壁裂縫處鑿出一個小孔，於是，有了因刻苦讀書，而有了「鑿壁偷光」這個成語的誕生。我塊，除了想出人頭地，幹一番大事外，如果沒有閱讀的快感，匡衡是不會冒著與別人打架的危險，去「鑿壁偷光」的。而晉代車胤家貧，沒錢買燈油，又想晚上讀書，便在夏天晚上抓一把螢火蟲來當燈讀書；映雪則是晉代孫康冬天夜裡利用雪映出的光亮看書。於是，又有了「囊螢映雪」的成語。匡衡與車胤、孫康都是很貧窮的孩子，但不管生活怎樣貧窮，閱讀的快樂總會驅散和忘記生活的貧困。還有騎在牛背上讀書的唐代李密，那該是多麼愜意的事情，在藍天綠草間，悠閒地騎在牛背上，優哉游哉地讀書，那真是神仙過的日子。我想，這都是閱讀的快感在他們身上的體現。但「懸樑刺股」、「聞雞起舞」來讀書，就沒有必要了。為了追求功名讀書，把頭髮吊起來，用錐子扎自己的大腿；半夜爬起來讀書，那樣簡直是殘害自己的身體，那還有閱讀的快感呢？

在我看來，讀書是用不着非有書房、沙發不可的，也用不着「紅袖添香夜讀書」，只要一冊好書在手，無論在草地，無論在車船上，或是在人聲鼎沸的鬧市，都可以閱讀。只要我們胸中有書，心無旁騖，那一塊塊方塊字會始終吸引著我們眼簾的。我曾經在冬日的草地上，伴著衰草斜陽，讀傑克·倫敦的《荒野的呼喚》，那精彩的故事，引人入勝的細節，深刻的哲理，使我忘記了時間，忘記了寒冷，始終被那隻變成了狼的狗的命運牽動著，直到一口氣讀完整本書，直到夕陽殘盡，黑夜降臨，但大腦中久久飽含的快意卻無法散去。還有一次，朋友約我去釣魚，朋友並不是標準的釣魚迷，口袋裡還帶了一本林達寬的《總統是靠不住的》。我想看這本書已想了很久，便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拿起來就看，連魚也不釣了。朋友那天收穫不小，釣了七、八斤魚，而我最後是空篋而回，但心裡卻很舒服。

而今天的許多人讀書，除了掙錢，考文憑，為做官、為往上爬而做秀，似乎讀書再無其它意義。讀書，只是成為他們賺錢，往上爬的階梯，這是多麼可怕而又可憐的社會。

不過，我在火車、汽車上是不看書的，一是怕在顛簸的車上把眼睛看壞了，以後沒有看書的本錢（咱還懂得點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的道理）。二是特別羨慕車窗外的景色，那飛奔而來而又飛奔而去的景色，實在是一本碩大無朋的書籍，讓人百看不厭，浮想聯翩。

書讀久了，便覺得讀書成了生命中的一部分，成了生命中快樂的事，而這種快樂是金錢、地位所帶不來的，它給了我最多的精神的愉悅，使我感覺到生命的美好，帶來人生的憧憬，能在人生的路上勇敢地走下去！



「鑿壁偷光」 網上圖片

## 赤有可聞

吳羊璧

### 赤帝子與白帝城

看電視片集《三國》，看到劉備兵敗退入白帝城，忽然聯想到他的先祖劉邦的一件事，覺得倒也有趣，可以說幾句。

劉邦起義的時候，前面路上有條大蛇。劉邦走前去一刀斬了，表示起義的行動開始了。後來傳說，夜裡有個老嫗在斬蛇的地方痛哭，說她的兒子是白帝子，給赤帝子殺了。

歷代起義，時常會附帶流傳一些神奇的說法，表示起義者很有來歷，可以壯起義的聲威。劉邦這個故事，就說明他不是凡人，是赤帝子，現在他殺了一個對手白帝子。

漢朝四百年，是最長久的皇朝。不過到了蜀漢，已是尾聲，漢朝最後一個有作為的皇帝是劉備（劉備的兒子阿斗已不足道），劉備之死，就死在白帝城。白帝城結束了赤帝子的朝代，這不是一個有趣的巧合嗎？

白帝城在現在的地圖上已找不到，據文字資料，地點在四川奉節縣東。三國的時候，蜀漢地在四川，白帝城是通向吳國的要地。白帝城近巫峽，從那裡向下游，水勢很急，也很險。

李白有《早發白帝城》絕句：「朝辭白帝彩雲間，千里江陵一日還。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。」李白以他的豪氣，抒寫了輕舟過急流的三峽景象。

從李白的詩，可以知道唐代這裡仍有白帝城。仍然是交通樞紐。劉備在白帝城時，曾改名永安。但李白詩還是稱「白帝」名。

三國時期，魏、蜀、吳的多個爭戰要地，都在現在湖北襄陽那一帶，那時這一帶就是荊州。

看來，李白曾經暢遊過這一帶的古戰場。在赤壁作《赤壁歌》：「二龍爭戰決雌雄，赤壁樓船掃地空。烈火張天照雲海，周瑜於此破曹公。」現在赤壁之戰的舊地，在湖北蒲圻縣，湖北有赤壁市。

近年中國的旅遊業發達，許多地方都奮力把當地往日出名的事跡和人物，遺跡找尋出來，使之成為吸引遊客的熱點。《三國》大片現在熱播熱銷，三國的爭戰舊事又膾炙人口，這一帶實在是很現成的旅遊線，到處有故事，可以吧導遊的口說說乾了。也許早就有這樣的旅遊線了吧。

這一帶，如果以襄陽（荊州）為中心，那就很近

白帝城、巫峽，出名的八陣圖也在這裡，不過現在是不是還有遺址，就難說了。當年諸葛亮曾經在這裡布下了石陣，用巨石列陣。陸遜打敗劉備之後，趕到這裡，見有殺氣，不敢輕進。土人說：「此處名魚腹浦。諸葛亮入川之時，驅兵到此，取石排成陣勢於沙灘之上，自此常常有氣多雲，從內而起」（《三國演義》），陸遜進陣，差點出不來，好在有個好心長者引路而出。長者原來是諸葛亮的岳父黃承彥。他說，這石陣按遁甲（術數）的變化而建，每日每時，變化無端。如今，原來的八陣圖應已不在，但可以重建，再立一塊碑，刻杜甫的詩句：「功蓋三分國，名成八陣圖。江流石不轉，遺恨失吞吳。」杜甫當時應該仍可見到「江流石不轉」的景象。

《三國志·蜀書·諸葛亮傳》說：「亮性長於巧思」，舉出的例子有木牛流馬與八陣圖。

在那一帶，還有赤壁之戰的地區，有江夏、華容道、長坂坡、麥城等等。稍北，有官渡（官渡之戰很出名），西北，有斜谷、陳倉、五丈原，近成都的北方，是落鳳坡。在這些地方，如果修旅遊點，處處都可以立一座三國名人的塑像，華容道上的關公、長坂坡上的張飛、五丈原的諸葛亮、落鳳坡的龐統等等，都會令遊人在那裡徘徊感嘆。

《三國》中可以令人懷思的地方還很多。上面說的只是三國爭戰的焦點地區。至於魏、蜀、吳，則可以各自成為一條旅遊線了。

## 古典瞬間

馮磊

### 黃袍加身

敘利亞人阿普里埃司做了埃及的國王。他派遣一支軍隊去攻打庫列列，但是，這支軍隊打了敗仗。失敗了的士兵們滿懷怨憤回到埃及。他們認為，國王是故意要他們去送死的。於是決定背叛國王。

阿普里埃司聽到了這個消息，就派自己最親信的大臣去和叛軍談判，希望能夠和平解決這個問題。讓人沒有想到的是，這位名叫阿瑪西斯的大臣在講話的時候，一名埃及士兵從後面走過來，把一個頭盔戴在了他的頭上。之後，士兵告訴大家，說這是王權的標誌。

被亂兵推舉為王的阿瑪西斯並沒有拒絕（估計很少有人會拒絕的吧。於是掉轉矛頭去攻擊自己的主子。原有的國王聽說之後，就派了一名德高望重的大臣去對阿瑪西斯。但是，這位大臣沒有成功。結果，國王一怒之下割了他的耳朵和鼻子。

這種嚴厲的手段，讓大批的埃及人感到失望。不久阿瑪西斯發起進攻並取得了勝利。他囚禁了阿普里埃司，後來讓別人絞死了他。

這是一個典型的西方版黃袍加身的例子。公元800年，後周大將趙匡胤奉命征討北漢和遼國。走到陳橋驛這個地方的時候，身邊的一批士兵將黃袍披在了趙匡胤的身上。之後，趙匡胤兵不血刃，就取得了政權。這就是北宋的建立。

亂軍之中，有人希望通過簡捷的手段（儘管可能是不公平的）獲取政治上的勝利。同樣的，也有人希望藉機通過別人的擁戴而擁有天下。在這類事件中，恐怕沒有必要去在意被動和主動的區別。公元959年，當那批前去戍守漁

耐人尋味的是，站在陳勝們的角度來看，一個政權究竟是否具備合法性似乎並不重要。天下是強者的天下，叢林法則在人類社會裡固然顯得突兀而可怕，但確實是一個赤裸裸的現實。陳勝以後，建立了漢朝的劉邦不也是一個流氓嗎？從本質上來看，劉邦的發家，不是一個小混混的角色開始的嗎？不僅劉邦，朱元璋也是如此。想當年朱元璋取得天下之後，和劉基一起討論多年來造反的歷程（有點像暴發戶的年度總結了）。朱元璋笑着說，當年原指望做個小蠹賊，不意竟然輕鬆擁有了整個天下。

劉邦如此，朱元璋如此，其他人也是如此。只不過，無論哪一個獨霸三南稱王以後，都要粉飾一下自己，來一把君權神授的把戲罷了。

彷彿是馮夢龍《智囊》裡的一件往事吧，提到一位將軍奉命戍守邊關。寒冬臘月，有士卒倉促間為他披上黃袍。然後在他面前跪成一排，山呼「萬歲」。讓士兵們沒有想到的是，他們刻意推舉的這位將軍，馬上也跟著跪下，朝向朝廷所在的方向，高呼「萬歲」。這樣一次可能出現的兵變就土崩瓦解了。而他的這種手段，不僅為自己消除了可能的政治風險，也藉機向主子表明了忠心。



趙匡胤 網上圖片

## 未鴻

王璞

### 一個人和一家書店

前些日子我寫了篇關於香港二樓書店的文章，後來想想，香港的眾多二樓書店似乎還是缺少了甚麼，因而一直不能成大氣候，是甚麼呢？信是有緣，近日讀到的一本書《日本學人中國訪書記》，回答了我以上問題。因為少了一個像東京文求堂書店老闆田中慶太郎那樣的文化奇才。

我是相信天才的。既然一段歷史、一個時代、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會因一個天才而改變，一個行業因一個天才而改變又有甚麼奇怪呢？田中慶太郎於一九五一年去世後，文求堂也跟著關門，而日本書店業的文化沙龍時代也隨之凋零，這大概可作為我這觀點的一條例證吧。

「文化奇才」這頂光環是我獻給田中慶太郎的，因為我一時想不出更合適的詞彙來形容他。只有「文化」這個外延廣泛的詞彙，或許能夠概括他多方面的才能，同時也提示我們：作一個成就大事業的書店老闆，也跟成就科學家、文豪、總統一樣，需要天時、地利、人和各方面的定數和機遇。

田中慶太郎出身世家，祖上是京都皇宮御用書店「田中屋」老闆。另一書店老闆齋藤藤藏說他的風采「無論怎麼說都是貴公子一樣的風度」，跟他的家學淵源自然不無關係。更兼後天的修養：講求外國語大學中國語學科的高材生，講得一口漂亮的北京話。畢業後即到中國北京、上海、蘇州、杭州遊歷，遍訪各

破天荒不避嫌地專程去田中墓前致意。

其實田中慶太郎這個名字有段時間在中國並不陌生，不過是作為反面人物出現的。五十年末期，國內報刊上曾把他當作文化大盜來批判痛斥。事實上，至今收藏在日本的大部分中國古代典籍，相當一部分是通過田中慶太郎之手流去日本的。這使我不禁想到，若是這些典籍沒有流出去一直留在中國，在文革中它們會遭到怎樣命運？其中倖免於紅衛兵之災的一部分，留在國內就一定比收藏在日本更加安全，還能像今天一樣供各國學者前來瀏覽研究嗎？

我不想再問下去了，再問下去便有被人當漢奸罵之虞。

還是回到前面的主題，曾幾何時，書店在一個文明社會的作用與地位。

田中慶太郎晚年的經歷似乎回答了這個問題。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以後，田中慶太郎因為厭惡日本政府當時的對華政策，他不再去北京。自斷了其搜購的渠道之後，有關中國的講座也開得少了，他將書店業務重點放在出版與中國有關的書籍方面。例如《中國學翻譯叢書》這類系列叢書。從市場營銷的角度看，這類書當然沒甚麼價值，據一些文化人士的回憶，當人們問他這樣出版是否賺不到錢時，他回答曰：「出版嘛，就是把自己喜歡的東西做出來。」

我自然願意相信這話很大一部分是他由衷之言。但作為商人，只考慮理想也是無法生存的。文求堂早年的多渠道經營為其打下了定經濟基礎，這才讓它後來能夠始終堅守自己的出版理念。所以，基於廣博學識的獨具慧眼，目光遠大，才是文求堂出版成功的重要秘訣。